

STABILITY WITH GROWTH

宏观调控如何界定 / 政府干预功用几多
本币升值是福是祸

一场事关民生的争论 / 一个人人受益的命题
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何指点迷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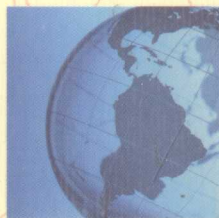
稳定与增长

宏观经济学、自由化与发展

Macroeconomics, Liber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美]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等 著

刘卫 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STABILITY WITH GROWTH

Macroeconomics,
Liber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稳定与增长

宏观经济学、自由化与发展



[美]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哥伦比亚] 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 José Antonio Ocampo

[美] 雪瑞·施皮格尔 Shari Spiegel 著

[智利] 里卡多·弗伦奇-戴维斯 Ricardo Ffrench-Davis

[印度] 迪帕克·纳亚尔 Deepak Nayyar

刘卫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稳定与增长: 宏观经济学、自由化与发展 / (美) 斯蒂格利茨等著; 刘卫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8. 8

书名原文: Stability with Growth; Macroeconomics, Liber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ISBN 978-7-5086-1240-9

I. 稳… II. ①斯…②刘… III. 宏观经济 - 经济政策 - 研究 IV. F0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6452 号

Stability with Growth by Joseph Stiglitz

Copyright © 2006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08 by China CITIC Press

Stability with Growth; Macroeconomics, Liber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6.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稳定与增长: 宏观经济学、自由化与发展

WENDING YU ZENGZHANG; HONGGUAN JINGJIXUE、ZIYOUHUA YU FAZHAN

著 者: [美]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

译 者: 刘 卫

策 划 者: 《比较》编辑室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49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 - 2007 - 3509

书 号: ISBN 978 - 7 - 5086 - 1240 - 9/F · 1392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http://www.publish.citic.com>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热线: 010-84264000

服务传真: 010-84264377

总 序

作为 CIDEG 文库的主编，我们首先要说明编纂这套丛书的来龙去脉。CIDEG 是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的英文简称，成立于 2005 年 9 月的 CIDEG，得到了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提供的资金支持。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起设立这样一个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是基于一种思考：由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很多问题，比如能源、环境、公共卫生等，不光局限在科学领域，还需要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参与进来，比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以及工程研究等，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我们需要不同学科学者相互对话的论坛。而且，参加者不应仅仅来自学术圈和学校，也应有政府和企业界。我们希望把 CIDEG 办成类似斯坦福大学非常著名的公共经济政策研究中心（Stanford Institute of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SIEPR）那样，对能源、环境问题进行经济和政策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大学应该关注基础研究，大学的使命是创造知识，在深层知识的产生上发挥作用。而产业部门的任务是把技术成果商业化，大学和产业之间的连接非常重要。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忘记政府的角色，特别是对于一个发展中的转轨国家，政府职能的定位和边界至关重要。CIDEG 的目标是致力于“制度变革与协调发展”、“资源与能源约束下的可持续发展”和“产业组织、监管及政策”为重点的研究活动，为的是提高中国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与教育水平，促进学术界、产业界、非政府组织及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学习和协调。

在2005年9月28日 CIDEG 召开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产业与环境”的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正是中国当今的产业和环境状况。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有28年历程，它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它为全世界的经济增长贡献了力量，特别是当其他一些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时候。不过，中国今后是否可持续增长，却是世界上许多人所关注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还面临着诸多挑战：资源约束和环境制约；腐败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糟糕的金融服务体系；远远不足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为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所必须面对的来自教育、环境、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冲突。这些挑战和冲突正是 CIDEG 将开展的重点研究课题。

中国刚刚发布的“十一五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对发展模式的调整，号召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增长模式、提高增长质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这也为 CIDEG 的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一个更有利的前景。

而中国对环境治理方面的研究显然刚刚开始，中国近年能源消耗的速度远高于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这种增长是不可能长时间持续的。最近《京都议定书》开始生效，哪些公共政策措施可以控制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气体的排放？建立一个排放权的市场是否对控制尾气排放有效？如何资助新环境技术的进步？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技术知识，也需要经济学素养。而建立一个环境监管体系，就不仅涉及法律问题和技术问题，更需要对广泛社会问题的考量。环境污染背后的实质是社会成本 and 价值的重新分配问题，因而要从社会系统的角度考虑环境监管。并且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环境污染的源头在发生改变，监管体系也就应该随之改变。

还有公共卫生问题，比如 SARS、疟疾、艾滋病等等，这是全球化的另一面。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加快了疾病传播，如何控制这些病的流行，不仅需要医生的合作，而且涉及许多移民的工作、生活和环境等问题。我们会面对许多类似的公共政策问题，解决方法要看历史因素和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就要进行国际比较研究。

中国是独特的。但是，由于中国也曾经是一个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有些研究是需要与过去同是计划经济的中欧和独联体国家相比较。与此同时，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在开始阶段农村人口都占很

大比重，传统社会规则是农业社群中的人际关系生发出来的。这些社会关系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这种发展形式和西方经济的发展很不一样，也与俄罗斯等不太一样。所以，在面对这些既有共同点又有独特性的问题时，比较研究会很有意思。虽然受制于不同的制度框架，但问题是共同的，比如社会保障、养老金问题，环境问题等等。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我们可以从新加坡、瑞典和其他国家学到许多经验。在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与环境的社会冲突方面，我们可以从日本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的环境立法、产业发展协调中学到许多教训和经验。所以，对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的研究应该是全球化的。

比较经济制度分析是一种概念工具，有助于理解不同经济制度如何演化。不同制度可能会融合，可能会继续保持差异。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政策不一定是普世适用的，在某些国家可能容易实施，其他国家也许不行，但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充分利用国际上已有的研究成果，收集和整理这些成果以作进一步的交流，是十分可取的途径。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比较、借鉴和学习也成为 CIDEG 学术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 CIDEG 理事长陈清泰的倡议，我们决定翻译并出版这套“CIDEG 文库”，介绍不同国家是怎样从农业国发展为现代国家的；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是如何处理与环境的矛盾的？这套丛书的内容选择非常宽泛，从学术的，到非学术的都在其内，目的就是给中国的读者——学生、学者、官员和企业家以及所有对此有兴趣的人提供更多的信息与知识。CIDEG 理事和学术委员为文库提供了第一批书目，并成立了编委会，今后我们还会陆续选择适当的图书编入文库。为此，我们感谢提供出版书目的 CIDEG 理事和学术委员，以及入选书籍的作者、译者和编辑们。

青木昌彦

吴敬琏

2006 年 4 月 10 日

前言 对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学 和资本市场自由化的不同观察视角

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辩论早在 2000 年中期时便已开始。西雅图的抗议者们曾导致最近一轮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暂缓，各方谈判者们在 2001 年 11 月之前都未能恢复谈判，直到发达工业化国家做出承诺，在下一轮被称之为“发展回合”的谈判中纠正过去的一些不平等问题。

而就在这之前的几个月，抗议者们也示威抵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在春天举行的会议，呼吁它们关注一些在这两个机构中都存在的比较严重的问题，包括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决策的有限性，以及这些机构经常推荐的预测和政策范围的局限性。在二十多年里，华盛顿的这些机构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后来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尽管这些政策中的很多比某些时候人们所意识到的更加微妙和注意措辞，但“华盛顿共识”还是反映了强调低通货膨胀、财政紧缩、私有化以及自由主义的“传统智慧”。然而，这种所谓的共识只包括了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里政策制定者们的观点，而没有包含在华盛顿、学术界或是发展中国家的其他很多人的观点。

为了回应这一辩论，一批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们于 2000 年在华盛顿发起了一场新倡议。参加这次新倡议的学者都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对话范围亟待拓宽，政策对话计划组织（IPD）便应运而生。IPD 的总部最初落脚在斯坦福大学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组织，一年之后搬到哥伦比亚大学直到现在。IPD 的资金主要来自福特基金会和麦克阿瑟基金会，也从莫特基金

会、开放社会研究所、瑞典和加拿大发展署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等机构获得资金。自创立以来，IPD 已经成长为一个拥有大约两百五十位一流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政策制定者以及市民社会代表等组成的、反映广泛观点的网络，并对任何方面的看法都给予了应有的关注。

IPD 的第一项业务便是组织了一批研究小组，考察了一些特定的政策辩论。这些研究小组的目标并不是在最佳的政策组合问题上达成共识，而是要确保其他可供选择的主要观点和视角得到充分的关注。每个小组至少有两位联合主席，一位来自发达国家，另一位则来自发展中国家。小组的主要成员是学者，但实际业务工作者以及来自国家经济机构、智囊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的代表也参与了研究。

在第一次大会上，很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与会者认为，过度的财政约束抑制了增长；其他人则担心，资本市场自由化会导致经济的不稳定。宏观经济政策和资本市场自由化（CML）成为第一批研究小组关注的两个核心问题。有数位与会者指出，资本市场自由化使宏观经济管理愈加困难。事情很快便明朗起来，在世界的某些地区这两个问题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因而这两个研究小组应该彼此联合工作。资本市场自由化问题小组的工作由一场在线对话而展开，2002 年这两个小组在纽约召开会议，2003 年他们又在巴塞罗那召开会议。¹ 这几次会议确定，两个工作小组将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主要差异，以及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多样化角度，考察宏观经济学和资本市场自由化问题。这些差异包括经济结构、制度、目标等的不同，它们都对政策具有重要影响。

自研究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以来，政策领域变化很大。就在我们第一次会议之前的几年，IMF 还试图在其章程中纳入促进资本市场自由化这样的强制性内容。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这一政策的优越性也持更慎重的态度，并且更多地注意到政策实施的代价。同样，对通货膨胀的讨论也出现了变化。20 世纪 70 年代，全世界都面临通货膨胀的威胁；到了 80 年代，这种威胁消失了；到 90 年代，在早些年可能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的货币大贬值却没有产生这样的影响；新千年开始之初，全世界都在担心紧缩的问题。

在过去几年里，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的发展中国家注意到，在

1 巴塞罗那会议由国际合作组织的国际关系中心举办。

20 世纪,“华盛顿共识”影响力最大的那二十多年恰好是它们在经济增长方面表现最差的时期。不仅对全球化的幻觉破灭增强了;对“华盛顿共识”的醒悟也同样增强了。然而,其他可选择的理论或是某种得到广泛支持的政策并未产生,所以,针对这些问题,现在迫切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更符合实际、更广泛的回顾。

本书由研究小组的几位主席联合撰写,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和资本市场自由化小组的主席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José Antonio Ocampo)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宏观经济小组的主席里卡多·弗伦奇-戴维斯(Ricardo Ffrench-Davis)、迪帕克·纳亚尔(Deepak Nayyar)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以及 IPD 执行董事雪瑞·施皮格尔(Shari Spiegel)。我们希望以公众易于接受的通俗方式来表达这些小组的研究发现,本书正是这样一份综述。本书的讨论也从 IPD 在越南、菲律宾、尼日利亚、利比亚、哥伦比亚、巴西、埃塞俄比亚、摩尔多瓦和阿根廷组织的数次政策研讨会中获益匪浅,这些在各国组织的对话将立法者、政府官员、学术界、工商界、国际经济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人士汇聚到了公开的、有时颇为激烈的辩论之中。我们相信,对于协商民主来说,这些对话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同时也希望它们能有助于将来把更广泛的观点吸纳到这种讨论中来,并最终催生更好的决策。尽管我们还不能完全避免使用经济学术语,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尝试让文章浅显易懂,以便于那些希望了解更多情况并积极参与政策讨论的决策者和普通民众能够理解。

本书试图建立一种人们可以评价其他可选政策的新框架。研究小组一致认为,华盛顿共识的目标过于狭窄(集中在价格稳定),工具太少(强调货币和财政政策),过度偏重于市场机制。新的框架侧重于真实的稳定,长期的、可持续的、平等的增长,强调把中期目标(如通货膨胀)和最终目的(长期的平等的增长)区分开。它强调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平衡:市场的不完备使政府有必要进行干预。

依据传统,经济学家们将他们的研究领域区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中又进一步将稳定政策和增长分割开。绝大多数的讨论和众多制度设计的任务都是遵循这样的划分。这就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在满足稳定化目标时极少考虑其对增长的影响,与此同时,又试图通过侧重于改善经济效率的结构性改革来实现增长。本书对这些分类提出了挑战。我们认

为，稳定化政策对长期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些政策的实施通常会带有负面影响。此外，结构性政策，如资本市场自由化，对经济的稳定性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联系解释了我们为什么在一本书中同时讨论宏观经济稳定和资本市场自由化。更为理想的是，我们能够把其他旨在促进增长的宏观经济和结构性政策囊括进来，考察它们如何影响经济的稳定。但是，这样的任务就目前来说实在令人生畏。我们希望本书现有的内容将能够避免相关研究分割过度的风险。

本书共分三篇。第一篇介绍了主要的问题以及从不同角度探讨经济政策的目的。在第二篇“宏观经济学”部分，我们考察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从保守派、凯恩斯学派、非主流学派的角度对稳定化问题的经济模型和政策维度进行了分析。在第三篇，我们将对资本市场自由化问题进行类似的分析。

有些读者或许会抱怨说，当我们讨论很多观点时，并不能做到平衡。我们当然承认这种过失，但是，我们在此也提出两个为自己开脱的理由。首先，在资本市场自由化问题的争论中，一方的观点已有很多证据。其次，“华盛顿共识”（又称为“传统智慧”）问题在其他地方已经得到诸多的讨论，大多数读者对那些主要争论都非常熟悉。相反，我们希望做到的是带给总的争论一种平衡，而本书只不过是争论中的一个部分。

总序	V
前言	IX

第一篇 概览

第一章 关键性问题简介	003
第二章 目标	010

第二篇 宏观经济学

第三章 政策的三个视角	041
第四章 宏观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有不同吗?	056
第五章 从三个视角看政策工具: 财政和货币政策	067
第六章 开放经济的复杂性	090
第七章 汇率管理和宏观管理的微观工具	107
第八章 政策框架	130
第九章 正式的理论	148

第三篇 资本市场自由化

第十章	资本市场自由化：支持与反对的观点	165
第十一章	正式的思路：资本市场的失灵	188
第十二章	对资本市场的干预	198
第十三章	资本市场自由化：总结及遗留的争论	221

结论篇

第十四章	稳定、自由化和增长	233
	致谢	247

Stability with Growth:

Macroeconomics, Liber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第 一 篇

概 覽

关键性问题简介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没有什么比经济增长和稳定更为重要了；同样，也没有什么比它们更具争议性。欧洲人在实现经济一体化十多年之后，还在争论欧盟（EU）的稳定条约和欧洲中央银行几乎只关注以牺牲就业为代价的防通货膨胀政策。欧盟的方式究竟是一种成功的稳定化政策的里程碑，还是其制度结构把欧洲送上了持续滞胀的厄运，如果不是衰退的话？在美国，有些共和党人变成了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赤字会提供美国经济所需要的刺激；同时，有些民主党人则认为，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不仅未给短期增长提供任何刺激，由此形成的赤字还将制约长期增长。

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稳定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关注。一般说来，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保守派经济学家们一直遵循反直觉的思路。在经济下滑时，他们建议采用顺周期的财政紧缩政策——与发达国家的政府通常采用的策略正好相反，与宏观经济学的学生们所学习的东西也正好相反。¹例如，在应对阿根廷、韩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危机期间，尽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这些国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下滑，IMF 仍主张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是一种具有讽刺性的历史大转弯，因为 IMF 的诞生得到了凯恩斯的智力支持，而凯恩斯热忱主张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即在经济下滑时增加开支和减税以刺激经济增长。²

按紧缩政策的批评者的说法，IMF 所主张的紧缩政策使经济下滑恶化。就连 IMF 自己现在也承认，它在东亚国家推行的政策建议是错误的。³IMF 独立评估办公室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IMF 惯于过高地估计增长和投资的前景，即使在未发生危机的国家也如此。这就必然使它提倡使用紧缩性的财政

和货币政策。

20 世纪 90 年代流行的保守性政策较为普遍地强调价格稳定、自由化和私有化。批评者们认为，这些政策具有误导性。他们指出，从长期看，这些政策抑制了增长。他们认为，政策制定者不应只关注反通货膨胀，而应注重真正的经济稳定和可持续的、平等的长期增长，并兼顾增长、就业和通货膨胀。

除此之外，批评者们还认为，保守派经济学家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结构性改革与宏观稳定之间的关系。20 世纪 90 年代实施的某些结构性改革，如那些鼓励各国自力更生的政策，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另一些重要的改革，如资本和金融市场自由化，⁵则将发展中国家置于外部冲击之下，并且降低了它们抵御这些冲击的能力。此外，像私有化这类改革在实施时缺乏必要的制度框架，导致（例如，由不加约束的垄断力量造成的）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广泛腐败（在很多国家，腐败程度之高，使得私有化被戏称为“贿赂化”）。

尽管经济学家们现在都认为制度是重要的，但国际顾问们对于如何建立这些制度尚无建议可谈，经济学家们对于什么是“好的制度”也存在意见分歧，例如，关于中央银行的作用、金融监管结构以及破产法等问题他们都有不同看法。如同我们将在本书中讨论的一样，所有这些争论对稳定和增长都意义重大。⁶此外，政策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依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好的制度对于经济稳定是必要的，但不仅如此，不稳定也会影响好制度的产生。例如，俄罗斯的高利率政策（以及没有建立有效的金融机构来为新的、发展中的企业提供信贷）使得财富的转移比财富的创造更有吸引力，从而无法有效地建立有助于资本积累的法治提供支持。

就像前文已证明的，经济学家观点和政策建议分歧很大。尽管如此，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有其权衡取舍。政策选择总是有风险的，这些风险涉及不同的受益者和受损者。制定政策的人也有关系。政治程序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如同其在大多数经济决策领域一样，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其他可选择的政策，或者说，如果有某种选择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最优的，那么我们可以把经济政策的设计交给国内的、国际的技术官僚和政府官僚。然而，其他可选择的政策和权衡总是存在。政策选择，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不能留给技术官僚去操作。

（对外和对内政策领域的）经济顾问的角色应当是指出这些政策的权衡，

解释并（在可能的领域）量化这些风险。国际金融机构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顾问，有时就未能做到这一点。即便其政策达到了承诺的结果，它们还是会被批评为优先关注某些问题而忽视其他问题。此外，这些机构在推行其政策的过程中，有时会削弱民主，因为它们未能让政治程序来权衡不同目标和风险的重要程度。

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事先的（基于当时可获得的最准确的信息基础上）好决策常常在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有时候，情况又正好相反。但是，政策制定者既不应该因为前者的发生而受过，也不应该为后者的出现而邀功。政策制定者及其顾问们应当承担的责任在于他们是否事先正确估计了其他可选择政策的权衡及其影响（包括其对就业和增长的风险）。如果他们假装认为，世上只有一种“正确的政策”，一种优于所有其他政策的帕累托占优政策，⁷那么他们就应该受到批评。

顾问们尤其具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就是不应打着主张某种单一的最优政策的幌子来推行那些只反映他们自己目的的政策。他们的任务是提出其他可选择政策的范围，对这些政策的后果进行评估，公平而精确地描述不确定性，特别是在那些经济学家们激烈辩论的领域（例如，关于如何最优地刺激经济的讨论）。一种普遍的担心在于，保守派经济学家们的建议通常都建立在那些引发过度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模型之上。如前所述，他们过于强调通货膨胀，几乎不考虑增长、失业以及对穷人的影响。

给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建议都未能指出其他可选择的政策，建议中也没有提出这些政策之间的权衡。更有甚者，政策的设计者们不仅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明显的差异，也没有注意到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同，以及区域内部的差别（例如，东亚和拉美地区的不同）。这种一刀切的建议无法对这些差别进行反应。⁸

例如，有些国家的制约因素比另一些国家要强。国内资本市场较小、获得外国贷款能力有限的国家采用反周期财政政策的能力较低。在发展中国家，工资和价格的不稳定性普遍较高，但有些地区的不稳定性要大得多。

同样，在很多经济危机中作用很大的金融市场在不同地区的发达程度也不同。证券市场对于分散风险极为重要，它在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对新投资而言只是一种有限的资源，⁹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证券市场却更加薄弱。在较发达国家，银行在融资中的作用已经下降，这使人们愈加担心强调以银